

宇野重昭先生访谈录

采访人：滝口太郎

时间：2008年3月27日

地点：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室（岛根县滨田市）

※※ 下面开始采访宇野重昭先生。此次采访是以台湾大学的石之瑜先生为主持人的《全球中国研究的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您的桌上有提问项目清单，我将就这些问题向您请教。

请您参考提问清单。在提问 1 至提问 4 中，有如下的提问内容：提问 1 是“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过程，提问 2 是“在校学习经历”，提问 3 是“选择中国研究时，受到何种较大的影响”，提问 4 是“如何决定研究课题”。针对这些提问内容，我想首先向宇野重昭先生提出几个概括性问题。同时，听说您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兴趣，其中也受到了您父亲和您爷爷的经历及讲述内容的影响，因此也想请您谈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宇野：由于提问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大概回答的时间会稍长些。请允许我逐一介绍。我从事中国研究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那时开始剪报，于是参与了中国研究。当时是大学的 1、2 年级。

之所以对中国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正如你刚才所讲，最初是受到了祖父及父亲的极大影响。据祖父讲，他曾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末期，作为日本专家被派往中国，教授农业建筑学及日本学。

接下来是父亲的影响。虽然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他也曾前往中国、印尼等国，负责农业技术的指导工作。那时，他有过很多极富刺激性的中国经历，我是听着父亲讲的许多活生生的中国现实成长起来的，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前，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有了这种环境，便开始关心中国革命的进程、国共内战等。这也成为我从大学 1、2 年级开始发奋学习的动力。

接下来，我将结合历史背景，对上述情况作以简单介绍。当时，东京大学刚刚完成改制，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让人觉得是刚刚起步。当时正值东洋史研究从全新角度重新认识传统、东洋史授课方法也发生改变的年代。我们是从三上次男先生那里知道这一情况的。所有这些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前所学的东洋史大多认为东方的历史是停滞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更是停滞的历史。但从那时起，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有了新的东洋史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这些观点的基础是新的东洋史学。

同时，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论非常盛行，它与区域研究相结合，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自 1950 年起被列入专业课，我选择了东洋政治外交史的课程。我在攻读东洋政治外交史课程期间，负责人是植田捷雄先生，他有非常强的国际法式的想法。本来，在日本的近代国际关系史中，国际法思想被应用得非常广泛。植田先生便属于这一流派，他是从这个角度为我们讲授东洋政治外交史的。

他的主张与以往的东洋史不同，归根结底，是一种与西欧方法论近似的方式为背景，努力弘扬亚洲传统的教学方法。我认为这构成了东洋政治外交史课程的特点。

与此同时，我还受到了从事中国革命研究的老师们的极大影响。高桥勇治先生极力主张开展孙文研究，并热衷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研究。我曾听过他主持的研究会，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植田先生与高桥先生在思想上有所分歧。虽然高桥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较为宽容，而高桥先生则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我的眼里，两者在将社会科学的思想应用于弘扬亚洲传统方面有着共同点，我认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教育模式。

接下来，大约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期前后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的全盛时期，现在所说的中国研究等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为主。只是，虽然称作现代化理论，但亚洲的近代化理论是非常有特色的，表现形式是思想先行。从这层意义上讲，我认为它是一种极易染上意识形态色彩的近代化理论。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的大学时代到研究生院时期的最大特征，自然便表现出在这种全球各种意识形态的潮流中探索亚洲特性的特征。

在这一背景下，我正式开始研究，与其说是遵循了这种意识形态或理念、观念，莫若说来自于希望完全依据现实、资料开展实证性研究的想法。

起因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了现有结论后进行分析方式。我想，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根据资料，该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其侵略过程及情况的分析、评价便会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结论有着极大的不同。这一时期，由于与事实有出入，为重新掌握准确的事实，有关太平洋战争的研究在日本及美国很是盛行。

我开始研究生院的博士课程学习后，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太平洋战争的研究。这属于彻底的实证性的材料分析，当时所使用的有关中国的资料包括未发表的资料乃至传单。当时日本曾在中国收集了一些传单以及各种零散的油印资料。挖掘出这些资料并加以研读，使研究在重新把握当时实际情况方面取得了进展。

问题是相互印证这些研究的环境十分重要。在这一方面，植田捷雄先生是通过从非常宽泛的领域将各种人才纳如自己的门下来完成彻底相互印证这一实证性研究的。

接纳了这些人后，植田先生创办了名为“畅谈会”的研究会。这一研究会虽然名为“畅谈”，听起来似乎是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但实际上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组织。在植田先生的这一畅谈会里，通过互相纠正资料中的错误或是阐述中的问题等，我感到自己奠定了中国研究的最前期基础。

当时的成员有坂野正高、卫藤沈吉和关宽治，是以他们为核心展开讨论的。这一组织在开展太平洋战争研究之际，也以其他的形式就资料正确与否展开过辩论。细谷千博、刚提到的关宽治、绪方贞子、齐藤孝等人也参与了太平洋战争研究。

当然，即使拥有资料，也不能仅凭资料还原历史，只进行资料考证是不够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在资料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组合和解释，是彻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这一辩论发生在我上研究生院的博士课到毕业之后的几年里。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虽然与之前的研究基调已然不同，但却出现了注重内在因素影响发展的倾向。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实证研究的开端，之前我一直侧重已经形成文字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为研究这种注重内在因素的发展观，我开始大幅度地转向用尚未形成文字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问题。

最初是从偶尔参加公害问题水银中毒症的实证研究开始的，当时是与鹤见和子教授及其他人一道开展工作。随着研究的进展和对尚未形成文字的事实、实物的彻底发现，我认识到，所谓的传统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而是由于解释才被赋予了传统的意义。不过，我们应当彻底把握传统的基础在人类的实际生活及社会

中如何存在。这虽然是社会学问题，但由于有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因素，所以社会学性质反而成了次要的问题。

内在因素发展论有关传统事物在新的外来因素的刺激下如何发展，外来因素的比重占多少等研究，实际上开始了如今人们所说的，如何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现代化冲击、公害影响的研究，人们如何对抗、社会如何对抗的研究。

内在因素发展论的研究，是鹤见和子教授与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经常开展的研究，他们俩是朋友。我当时任成蹊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所长，当时曾与中方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负责人朱通华先生见了面。其后，我与朱通华先生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实证研究。

当时日中学者实现了互访，我访问中国 5 次，进行了实地调研。其后，朱通华先生的小组 7、8 个人也来到日本，对当时被人们称为“阿信”家乡的山形县、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社会共存的长野县以及以传统型企业、产业为基础，推进现代化产业的广岛县的研究。

最后，中方人员也对日本进行了 5 次访问，来到推广“一村一品”活动的大分县等开展特色运动的地方进行实地调研。这是一次为期 10 年，以内在因素发展论为基础的互访调研，互相确认现场调查的事实和解释的不同。

那时我们最为担心的是，一旦此次调研成了单项研究，便等于单一的调研活动。于是，对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使之形成理论框架，如何才能够从这一理论中获得具有普遍性和广泛说服力的结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当时的普遍性与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时代是迥然不同的。所谓意识形态时代，是一种认为自己思想正确，主要表现为强调一元论。与之相对，所谓普遍性，从本质上讲，是认为普遍性具有多种形式，追求普遍性本身也具有多样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作为学者，我的主要产品是写书也写论文。

虽然称作普遍主义，我认为结果却属于多元主义，并带有多极性。这是一种各种各样的事物相互带来影响的思维方式。虽然触及的深层联系到某种普遍性，但这些不同的事物是各自发展，相互影响的方式产生新的普遍主义，对这一过程的探讨，人们认为可以运用到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中，并构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研究的重点。

其后，以此为基础，我在岛根县立大学创办东北亚学之时，应用了这一基本思维方式。在那里，我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研究的界限，开始进行广域地区的研究，进而从广域地区的研究进入超域地区的研究，最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形成东北亚学。在这一过程中，针对如何将前面提到的多元主义、多极主义的相互影响融入到中国研究乃至东北亚研究展开了讨论。

当时东北亚关系非常复杂。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相互重合，相互影响，使得独立性本身的结构非常复杂。通过对这些复杂性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观察，在日中之间找到了新的中国本身的研究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自己受到了一些人的影响，莫若说是作为学者，自己独自开创立了东北亚学。这一过程构成了我迄今的研究经历。

※※十分感谢。我也曾受到过您的影响，记得在您的研究成果中，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史及毛泽东的研究。接下来是有关如何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定位的问题。这些成果大体出版发行于您开始着手内在因素发展论研究的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前期。是否可以认为，您的这些成果积累于这之前的阶段，即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前期，发表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宇野：收集了上述的资料后，我开始将其理论化，进而发展成以内在因素发展论为核心的理论，在此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譬如以中共党史的研究为例，由于希望从根本上彻底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史实，最初是通过胡华教授、胡乔木教授等人，准确地说，是从铅版印刷的革命历史观之类的书籍中开始的。但当提出疑问，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时，便决定重新彻底搜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于是，便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位合作，共同编辑了多达 10 多卷的大型中共党史资料集。

那时，我希望能够彻底弄清当时的事实。例如，毛泽东研究，毛泽东选集中的论文与发表时的内容不一致。于是，采用了与资料对照，寻找毛泽东发言稿的原形的资料研究。

与此同时，从理论方面看，中国革命也许具有非常复杂的必然性，例如，中共党史排除了其他哪些可能性，中共党史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确立中国历史中的中共党史地位的等，我想，这或许这就是新的中共党史观吧。

所以，即使有关毛泽东的情况，我也是对当时毛泽东的原形资料被什么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创作出来进行了分析。这是对新中国政治史学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共党史研究及毛泽东研究，构成了我的转型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出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

※※ 原来是这样呀。下面想请您谈一谈您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经过和自己的研究经历。其后，将转到提问内容 5 之后。首先是提问 5 的“从事教师工作或研究工作的经历”，然后是“担任科目的经历”这两项内容。

您曾就职于成蹊大学的法学系。在我的学生时代，您担任的是国际政治理论课程。虽然在我的学生时代，成蹊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國研究专业，但听说您当时是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教员被录用的。就此，想请您谈谈自己决定就职于成蹊大学的经过以及决定担任这一课程的经过。

宇野：在成为成蹊大学教师之前，我最初曾在外务省工作过一段时间，有过在外务省亚洲局中国科从事 3 年的中国研究经历。当时，我主要是收集中国资料，整理统计数据，自己认为工作很努力。那一时期，自己对中国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但当时依靠中国研究是无法到大学就职的。

大学教授的职责本来是不会单独授予中国研究者的。那一时代，如果想从事这方面研究，首先必须担任国际政治或国际法的课程，所以，我同时从事了国际政治学课程和中国研究。我感到自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区域方面的理论研究。因此，在成为成蹊大学教师之时，被录用为了国际政治学的教授。

就职后，我感觉非常好，想以此为契机，开展亚洲研究和中國研究。自己希望直接开展中國研究，但考虑到当时前辈的不满情绪，只得暂时冠以亚洲研究之名。因此，担任了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后来的亚洲研究课程。不过，由于自己试图在研究班里教授感兴趣的内容，于是逐渐深化了中國研究，这就是我任课的经历。

※※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详细说明。接下来是提问 6，“属于哪些学会、研究会，导师是哪位”的相关内容。关于指导教授方面，记得东京大学的植田捷雄先生曾担任过您的导师。谈到学会方面，您既担任过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理事长，

其后也曾在这段时间里担任过亚洲政经学会的副理事长级理事。

宇野：在亚洲政经学会担任的是常务理事。

※※ 对不起。原来是常务理事。

宇野：是的。

※※ 能谈一谈您在学会中任职期间的情况吗？尤其是听说您曾是植田先生创办的亚洲政经学会的成员之一。

宇野：是的。在当时日本国内的中国研究团体中，出现了重视实证主义资料的人都集中到了亚洲政经学会，将重点放在革命史研究方面的人则到了中国学会的局面。由于自己较为重视资料，所以曾有过隶属于亚洲政经学会的经历。

其后，当时的亚洲政经学会由植田先生出面与外务省的一些人洽谈，由于协会的创办与外务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在外务省工作过的我便轻易进入了亚洲政经学会。最初参与了亚洲政经学会的实地研究或实证主义方面的资料分析，这是我加入亚洲政经学会的契机。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将中国问题作为其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学会，在开展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时，它也有着与中方进行各种密切联系的关系，所以，为加强日本政治学会中的中国研究部门的力量，我进入了学会。其后，我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还荣幸地担任了国际政治学会的会长。

一次，英国的国际政治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访问日本，在参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会议时，她不解地问，“在日本，为什么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担任会长？”我回答说，“这是由于日本的国际环境、外交特点与中国外交联系紧密的缘故，这种情况虽然较为常见，但不一定只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总之，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作为对中国关心度较高的学会而得以发展起来，我也因此有了发挥特长的环境。

※※ 谢谢。接下来是“获得了哪些经费”的问题。当然，宇野先生获得研究经费的渠道很多，但我希望了解的是有关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以及《新中国资料汇编》方面的经费来源。据悉，您在这些编辑工作方面曾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这些项目曾获得过外务省等的补助，或者说是研究援助费用吗？

宇野：通过外务省，从大藏省领取过相当数量的经费。我记得总共有几千万日圆吧。作为外务省职员，我参与了最初的规划与协商工作。虽然该项目是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为核心开展的，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资金援助，则无法取得较大的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说所有经费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现在的外务省，从大藏省获得的援助。

除此之外，谈到援助，在其后开展内在因素发展论研究时，进行了 10 年左右的中国现地调查，当时的经费中，政府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比如说 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吧。NIRA 的援助资金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这些来自政府的资金援助在我迄今的研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谢谢。接下来的问题或许有些偏离研究经费。记得我年轻时，曾听说在您编纂《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过程中曾有过许多有趣——不知这样说是否合适——的事情，记得您在开展研究时，在人际关系或研究内容方面曾有过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希望您能够谈一谈。不知意下如何？

宇野：编纂这部《资料集》时，带头人是石川忠雄先生、卫藤沈吉先生，山极晃、藤井升三和我负责实际工作，还有姬田光义、毛里和子等年轻人参加。大家曾围绕编辑方法、资料的取舍、翻译等问题争论不休，尤其围绕获得特殊资料时的公开方式，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记得我当时在自己的研究班里，曾讲过其中的部分经过。

关于对那时的学生们以及研究班的成员的教学方法，从时间上讲，采用的是半用于阅读书籍，即花一半的时间去阅读各种文献资料，另一半的时间用于听取大家宣读论文并展开讨论的形式，重点则放在了如何通过中国研究，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方面。

具体而言，授课时常使用这样方法：尽量使用原始资料，属于我们自己发现的资料，这些资料大概是日本人迄今未见，而且连中国人也不太了解的资料，大家兴奋地谈论这些资料。例如，偶尔在外务省陈旧的四层楼的大型资料库的角落里发现布满尘土的特殊资料，一旦了解到这些属于非常重要的资料时，就会在授课中介绍给学生们。

用于授课中的最主要动机，是希望告诉学生们，知道这段历史的只有自己，挖掘它的也只有自己，自己因为是新的历史发现者，同时也是这段历史的诠释者而感到欢欣鼓舞。这种情况在中国研究中非常之多。欧洲研究则无法与之相比。

基于这一情况，一边重复强调中国研究的有趣性，一边阅读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外语资料，召开研究会，听取大家的想法。这并非泛泛的讨论。那时，在允许的范围内，讲解一些与资料有关的趣闻。然后告诉大家。你是学生中的一员，在你们中今后会出现几位学者。在这一点上，我一直以此为荣。

※※谢谢。下面是提问 8“授课计划、授课内容”及提问 9“如何指导、评价学生”两个问题，想请您谈谈自己授课方式及在迄今的授课中您担任的是哪一科目。另一个问题虽然在您提交的资料中也有所记述，刚才您也曾有所谈及，那便是您在授课方式方面曾被警告过。请您也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尤其是当时的千字报告这一训练方法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请您谈谈，有哪些授课是一直延续至今的，不必全部谈到。

宇野：从科目方面看，我担任过前面谈到的成蹊大学的国际政治论、亚洲研究以及其后的东洋政治外交史等课程。例如，在任东大法学部的外聘讲师时，担任过东亚国际关系史这样一个很时髦名字的课。

其后，将中共党史作为课程搬上讲台，是在上智大学时。由于在上智大学讲授中国共产党史的时间很长，曾被问及为何在基督教大学中教授中国共产党史。虽然后来改变了形式，改为比较亚洲论，但这却是一个令我记忆犹新的课程名称。

接下来，在一桥大学时，我担任了过原本由细谷千博先生负责的外交史课程中的亚洲外交部分。如果谈到归类，该算是历史论，而在现代分析方面，多以外交论之类的名字出现。

在成蹊大学和上智大学时曾开办过研究班。在研究班里，我曾要求学生撰写

过千字报告。总之，这一做法非常有必要。我认为，它能让学生们去自己思考，并将思考结果清楚地形成文字，用语言表达出来和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形成文字之时，这与以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并加以理论化有着不同，将之完整地归纳于一千字之内的练习，是研究班最为有效的方法。

我深深感到，尤其在研究像中国这样有着庞大内容的对象时，采取从一个个侧面去归纳整理成千字报告的方法比较有效果。我想，这种千字报告的方法——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大——对接受过这一训练的人来说，都在其之后的各种工作中发挥着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 关于以前的千字报告，我记得曾听您说过，曾成为外务省时期报告形式的基础。

宇野：与其说是成为了基础，莫若说是报告的开端。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为三段构成，首先需要在前三行写出结论；接下来是对前三行的结论为何能够成为结论进行论证；最后列出增强结论说服力的资料。在外务省内部撰写报告时，最前面结论部分的三行便要占二百字左右，再加上附言，大体为一千字左右。

如果开头部分的结论没写好，其后面的部分就没人读，因此，在外务省撰写报告期间，我曾进行过自我训练，采用的是在开始部分提出问题，编写摘要或结论，撰写短小、紧凑的文章，然后展开论争的方法。但真心而言，外务省的这种方法存在不足之处：由于在开始部分提出了结论，所以有些失去了继续阅读下去的意义。始终针对结论进行论述的形式会更好些。

因此，我将这种外务省的方法按照自己的设计做了修正，为了能够以最少的字数阐述最为精炼的内容，采用了从假设到论证，然后是结论的普通架构形式。虽然源于外务省，但经过脱胎换骨，开创了新的千字报告形式。

※※ 谢谢。接下来是关于您的授课的回忆。记得您非常严格，尤其在本科时期。或许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曾经发生过报告人在报告当日腹痛的事情。请您谈谈，您对学生的这种坚决的态度，是否有意识这样做的呢？

宇野：并不是刻意这样做的。简而言之，或许是由于其他老师认为我的研究班学生中精英比较集中，结果自己不得不实施严格的管理吧。换而言之，在前面谈到的千字报告这件事上，我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或每周必须完成，绝对不允许拖延时间或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对内容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说这最终给大家带来了心理方面的压力，我认为还真有些对不住大家。

同时，我采用这一做法，是希望尽量把好的内容介绍给大家。或许由于曾让写出优秀千字报告中的学生在大家面前朗读，强调找出大家的长处、优点，采取了公之于众的方式，反而带给了大家压力。从这一方面讲，我觉得或许结果上比较严格，但态度上则非常温厚，内容上比较严格吧。

※※ 当然，大家都知道您总体上是爱护学生，但授课非常严格也是事实。与本科的学生相比，您在给研究生院的学生授课时，是否有所注意过呢？

宇野：我希望学生升入研究生院后，首先要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有很多人嘴上说着要做些什么，却不知该如何做。所以，我希望学生们只要升入研究生院，就

必须抱有明确的该做什么的问题意识。然后，尽可能有效地大量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同时，掌握其大概的整体脉络。

在进行中国研究时，虽然希望学生们能不断强化自己的知识积累，但却不能对中国抱有先入之见。希望他们能够以事实为依据开展自由讨论。

※※ 是的。回想起研究生院的学习生活，当时曾有过自由组合的“四月会”。这对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来说，这种讨论会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听到您前面提到的情形，也听说过植田先生的“畅谈会”，我想这之间或许有所关联，或是基于相同的想法。因此希望您能就“四月会”的情况做些简单的介绍。

宇野：关于“四月会”，诚如所言，的确其最初的想法是因为脑海里有着植田先生的“畅谈会”的影子和模式。但是，植田先生当时基本上是让大家对所读过的书的内容进行介绍，是将重点放在了对书的内容理论进行辩论方面。

我创办的是在第四个周的周一聚会，所以称为“四月会”。“四月会”的重点放在讨论方面。我认为，过多阅读已有的书籍，手脚会便受到束缚，进而很难展开辩论，并导致最终的失败。我想，尽量让大家使用更加能够展开彻底辩论的材料，这一做法总归有着其独具的特点。

同时，四月会时期，我认为最成功之处在于能够让完成研究生院博士学业课程的学生们参加，吸引了各领域的人们。不仅是成蹊大学的学生、从我担任外聘老师的大学里，例如横山宏章、天儿慧等人也参加了，都立大学的小竹一彰、上智大学的星野英一等人也参加进来，许多大学的人都参加了。

所以，有一些开展中国研究新项目且希望进行探讨的人，无论是来自津田塾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即使是不曾任教的大学希望前来参加的人，也都是来者不拒，范围进一步扩大。虽然时间算不得规范，但正因为如此，才得以开展了较为自由的讨论。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基本思考方法，那便是自己在研究生院的授课中，无论是自己所讲授教义体系还是对象，或是出版物等，是绝对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学者的。大概研究生们与我所掌握的知识有所不同，或是具备许多我没有了解到的出色的能力。我觉得不能对他们强加干涉。

以上便是“四月会”的大体特点，其持续时间比预想的长了很多。

※※ 时至今日，仍没有完全解散，只是大家聚会的时间较少，不怎么召开会议而已。

宇野：现在也非常希望当时的小组成员能够经常地聚集在一起呀。如果有什么机会的话。

※※ 是的。感谢您的讲解。接下来是提问 10 “如何评价日本的各中国研究学会”以及提问 11 “与海外的中国研究以有过哪些接触，如何评价”这两个问题。

尤其希望您能重点谈谈提问 11 中的问题，并联系日本的相关情况。

宇野：日本的学会，我主要参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亚洲政经学会的活动，与和平学会以及国际法学会等有过关系，只是没有参加过现代中国学会。从这一意义

上讲，与其谈中国学会，莫如谈包括中国的各学会情况好些。

但是，如果从整体现状看，或是与欧美等学会进行比较的话，首先应该说日本的学会更认真些吧。整体上运营秩序井然，提供了更多的发表机会，积极性高的人不断发表文章。

从这些情况看，例如，我多次访问过美国的 ISA 等学会，也曾成为其理事会议成员，但大家都随意缺席。这在日本学会是无法想象的。觉得大家只谈些自己想说的事情，不像日本的学会，缺乏集中力量针对统一的课题讨论的氛围。

所不同的是，对个别资料的分析非常彻底。在欧美的学会里，即使是亚洲研究方面的学会，对资料的分析也非常彻底。在这一意义上，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每年都在变化。开展新的研究，挖掘新的资料，早于他人发表成果等，竞争异常激烈。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各行其事，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其积极、非常有趣的一面。从结果看，与最初的预想出入较大甚至大相径庭的情形居多。因此，就学会的规模而言，美国是以远远超过我们的规模在开展研究，但其出席规模则较为分散，常常是较少人员分别聚集到一些较小地方。因此，多表现为类似于即席讨论的形式。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因此，参加较好的小组、较好的部门会议时会让人感到非常有意思。但毫无意义的部门会议也比比皆是，让人觉得有些甚至比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 19 个部门会议的水平还低。

但美国人很有特点。我在介绍日本的中国研究时，比如谈到美国的**本杰明·史华兹**如何解释严复论等内容时，他们都会听得非常认真。当我的报告结束后，他们甚至会当场邀请我前往其大学举办讲座。其热情非常高昂。

日本的学会中则没有这种高昂的热情。日本与美国的学会氛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的印象中，整体的氛围表现为，美国方面至少在新资料的挖掘、解释及理论化方面领先一步，同时，他们也非常尊重并倾听日本方面独到的解释与思想。

此外，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如德国，虽说也有学会水平的研讨，但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很少聚在一起讨论。中国学者之间开展讨论时，如在 20 多年前，德国的中国研究专家等曾提出令我们有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想法——针对中国以迅猛的势头取得发展，在未来几十年之后，在东亚地区，日本有可能无视中国便失去任何发言权等。虽然德国的中国研究水准绝对算不上高，但他们在大胆预测，提出各种假说并锲而不舍方面令我很感兴趣。

此外，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共产国际研究以及孙文评价等方面，与俄罗斯的学者交往频繁。我也曾在莫斯科作过报告。在我的印象当中，每次报告时，俄罗斯的学者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我们日本人的中国研究情况及对中国的诠释。

但随之而来的反驳大多令我意想不到，提出的完全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迥然不同类型的问题，我曾感到无法交流。

这种情况姑且不论，对为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与俄罗斯人围绕中国研究无法交流进行分析，会产生双方在对中国的关注角度及对希望从中得出的普遍价值的思维方式上原本就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印象。从这些方面看，我觉得俄罗斯的学会与日本的学会之间的差异性很有意思。从客观角度讲，这种落差很有意思。

※※ 谢谢。接下来的问题是提问之 12——“欧美的社会科学及思想（马克思、韦伯、帕森斯等）、受到欧美中国研究的影响”。

宇野：当然，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曾在日本的学会里风靡一时。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及亚洲政经学会情况都大体相同。尤其在亚洲政经学会，韦伯研究非常流行，围绕着将韦伯的方法论引进到中国研究中将会出现怎样效果的讨论非常盛行。所以，我感到韦伯的影响非常巨大。

尤其是成蹊大学的安藤英治先生。就这位韦伯研究专家的立场来说，有意思的事，他对儒教和道教的解释与我们这些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的解释全然不同，我与他曾有过很多次争论。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韦伯对日本的中国学者的影响非常大，在日本学术界，或许实际上韦伯比马克思的影响更大一些。

谈到帕森斯，总的来说，他对专门研究思想史的人影响较大。就我自己的情况看，还是英国的爱德华·H.卡尔的影响大些。爱德华·H.卡尔晚年的著述《**历史是什么**》由于在研究班中大量使用过，自不待言，其大部头的著作《布尔什维克革命》等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之所以说对日本的中国学者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是因为此前在爱知大学的中国问题研讨会上，有几个人都引用了爱德华·H.卡尔的文章，这再次印证了其具有的潜在影响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曼海姆的影响非常巨大。这种影响虽然源于丸山真男先生对曼海姆的评价，但从另一层面而言，中国研究界也表现出了极强的学习曼海姆的倾向。

这一方面也说明，在如何边摸索理智的学习方法，边构建起实证研究方面，与其说是纯粹的社会学，莫若说是曼海姆的方法更适合日本人。

所以，我的研究生院学生中有很多人大概都读过曼海姆，包括我自己。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自己受到欧美的影响比较大。

※※ 我记得您的博士论文似乎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方面的内容，其中受到美国的**费正清**以及**史华兹**的影响很大吧。

宇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这一构想，由于阅读了很多美国所谓有关共产国际及东亚关系的研究成果，有受其影响的一面。

但是，具体到共产国际与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很有名的学者。而从更广的范围看，有些人从所有西方影响，包括共产国际的影响方面进一步对其整体进行相对化研究，例如，无论是费正清、史华兹还是 **Conrad Brandt**，我从这些人所进行的研究中都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在受到这些影响的同时，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准确的说，与美国的研究相比，我认为自己在论文撰写阶段受到爱德华·H.卡尔的影响更多些。

※※ 第13问到第15问想请您谈谈有关与中国的关系问题，首先是第13问的内容是“您经常访问过中国吗？在中国有何经历？”。的确，您曾多次访问中国。那就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吧。

宇野：访问中国大陆，大概有24、5次吧。其次是台湾，共去了3次。

谈到在中国的经历，在北京是以受邀者或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北大讲了半年左右的学。其次是以顾问教授的身份在复旦大学进行过讲演，但却没有讲过学。

接下来，现在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如今是那里的名誉研究员。我便是以这些不同的身份前往中国的。在中国期间，最特别的经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在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中共党史的集中授课。我认为这是最为特别的授课。虽然是以讲师的身份授课，

但前来听课的学生却是最多的。

※※ 中国学生对山东大学中共党史讲义的反应如何？

宇野：学生并没有太多反应。前 3 排大都是各大学中共党史任课教师，倒是他们的提问非常踊跃。之所以提问如此踊跃，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使用了大量在中国尚未公开的资料，来自俄罗斯、美国等的资料当时还未必完全公开发表。因此，每当授课一结束，提问便会接踵而至。

也有学生递来提问条，但问题大都属于循规蹈矩一类，如与胡华先生、胡乔木先生等所撰写的内容不同时，便会有“这是否错误”之类的提问，几乎没有有关内容方面的提问。

※※ 对中国学生而言，中共党史与其说是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莫若说是更让人感觉像正规教科书吧。

宇野：是的。大概在很多学校都属于必修课，作为必备的必须掌握的教养和知识。所以，当我谈到遵义会议，配以资料，详细讲解遵义会议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大家都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教科书中的描述相对简单。

由于上述情况，对中方人员及学生来说，当时的气氛显示，他们似乎不太关心这些配以特殊资料的诠释，或是不视之为讨论的对象。

顺便提一句，在北大授课时，学生写来纸条，相关的提问非常热烈。

※※ 在北大的讲义也是关于中共党史的吗？

宇野：不是的，在北大讲授的是国际关系，是从国际政治与亚洲的角度，讲授包括日中关系在内的亚洲外交史。这一课程的提问也非常多。我甚至对他们倾听我讲义时的认真态度感到惊讶。

我认为他们与日本学生有所不同。即使在考试时，日本学生对如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也会从各方面进行思考，然后再写在纸上。而中国人则准确地记住我所讲过的内容，并写出来，然后再加入一些评论。我感到中国学生的听讲方式（与日本学生）有着很大的不同。

※※ 接下来是第 14 个问题，虽然在您的回答中已经包含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与中国学术界及其他方面有何交流及合作的经历？”这些情况包含在您刚才您所提到的内容里吗？

宇野：是呀，总之，说道刚才曾提到的有关最大交流这一问题，我曾与费孝通先生合作研究过 10 年。我想这算是最大吧。在这一项目中，我与中方的人员一起奔赴当地，调查研究结束后还召开了几次合作研究会。

※※ 您是指小城镇研究项目吗？

宇野：是以小城镇研究为核心。先是小城镇，然后是城市化的研究。非常典型的情况是，围绕日本和中国在农村工业会或城市化过程中的领导人的状态，即领导

层、主要领导层等的产生过程、职能等问题的讨论较多，以日中共同的兴趣对象形式，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

※※ 接下来是第 15 问“有无深交的中国朋友、亲戚，是如何认识的”这一问题。您没有亲戚吧。

宇野：没有亲戚。

※※ 我想您有很多朋友吧。

宇野：是的，与我们有交流的大学里，有很多学者朋友。前面曾经提到过，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有，我在访台期间，拜会过很多大学的老师，与其说是有组织的会晤，莫若说私人性质的面谈。

再者，比起前往中国，更多的是邀请对方来日本。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经常从中国大陆和台湾邀请学者来访，20 世纪 90 年代后，两地有很多这样认识的朋友。

※※ 在 80 年代，受到日方邀请，能够前来日本的中国老师中，地位高的人较多。最近是怎样的情况呢？

宇野：是的。尽管如此，还是大都邀请比较有名的老师。90 年代之前，邀请的大多是比较有名气的老师……。邀请普通的大学教授，如今活跃在研究一线的人，是最近 10 年左右的事情。日方的年轻骨干前去访问，实现了这一层次的交流，大概始于 2000 年前后吧。

※※ 接下来的问题题目较大，是第 16 问“如何看待中国的将来？将会有哪些变化？”

宇野：嗯，就一般的观点而言，正像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有观点认为，在显示国家整体数据的 GNP 总量方面，2025 年到 2030 年，中国将赶上日本，2040 年到 2045 年，中国将赶上美国。

这些情况，不，人们也了解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一些地方的购买力或实际生活水准未必就是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因为时间和地点的不同，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换言之，我认为自己对报纸、杂志的报道的见解与其他人并没有太多的出入。

由于我的专业是东洋政治外交史，我是从这一角度观察事物的，即：不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是从将国家相对化的角度进行观察。总体而言，中国在清朝以前虽然也属于国家，但这真的属于西欧所说的国家吗？总的来说，从国民国家这一层面分析，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尚处在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甚至有人认为目前仍处于这一形成阶段，而且，只要其国民国家的概念不发生改变，近代中国是不能理解为国家的。

从整体看，从非常相对化的角度观察中国这一国家的思维方式占上风。以这一观点分析，其维系中国这一国家或组织的体系可以概括为思想或基于这些思想的思维方式以及民族的同一性。

中国的同一性原本为双重性质，其地区同一性与民族同一性之间似乎有着非常大的距离。从这种同一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整体同一性受到文化影响之处非常巨大。

中国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文化不同，含有许多与政治、经济及全社会相关的意义。从这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看，在中国的未来这一问题上，国家的力量变得如此之大当属于另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将会变得非常巨大吧。

至少超出了目前对事物及范围的国家性质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变得强大起来，将来或许会成为将世界一分为二的大文化圈之一吧。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 21 世纪中期到末期这段时期将成为围绕中国文化以何种形式开展的年代吧。

再有一点，便是文化相互冲突论。我的观点是，通过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其中的某些部分，虽然不会发生整体的改变，却能使其中的某些部分发生改变。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在超越国家范围情况下，在文化领域，世界史中的中国作用将会变得非常庞大。

※※ 接下来的第 17 问转到研究方面，是“已发表的研究成果”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您已经提交了相关资料的附件，我认为这些已经回答了相关内容。

第 18 问是“研究经历”。关于这一问题，在最初踏入中国研究领域的经过中您已经谈到过，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请您继续谈一谈。

宇野：关于我的方法论，刚才已经谈到过，即从重视资料现实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发展到内在因素发展论的思维方式。大概今后将会迎来超越这一内在因素发展论的思维方式，进入必须思考未来的时期。从自己研究的整体发展上说，我想是进入新的阶段。

本来，内在因素发展论在受到外来的影响时，传统是如何被唤醒、激活等的思考方法尤为强烈。由于外来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中国，如何形成新的传统，而且可以认为，其有可能变为前面所提到的双重同一性、三重同一性之类的形式，因此，与这一思考方法相比，我更希望今后能够从中国的内在性与外来影响性两方面，对东北亚范围或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再一次进行归纳整理，展开讨论。

我认为，今后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或许仍将发生变化，而且出现较大变化。虽然现阶段主要是从历史论的角度进行整理，或从近代化与传统的关系角度进行思考的时代，但这将会从根本上使方法论发生改变。

※※ 您解释得非常清楚。接下来是第 19 问“参与了哪些以往的学术领域的论争”。我所理解的情况是，宇野先生在学术领域参与的讨论之一是如何解析现代化问题。这也与中共党史的评价相关联。

其次是如何评价文革问题。最后是关于内在因素发展论问题的论争。我想，这是您如今仍在从各方面进行研究的问题。我理解有以上三点，希望您在可能的范围内谈谈相关情况。

宇野：关于论争问题，你提到了三点。第一个问题，围绕近代化论争的高峰期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最初是美国不断将美国式的现代化路线应用于亚洲各国，美国的财团等有组织地出资，向日本学术界提供大量的援助资金。这一时期，

关于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些资金，出现了很大的争论。

这一期间，关于这一现实问题，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论争。当时，虽然抨击的一方，即批评美国的一方占压倒性强势，但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市古宙三教授等人则坚持认为，接受亚洲财团或福特财团的援助资金，收集资料，推进研究，在现阶段是绝对必要的。

当时的情况是，通过研讨会等形式对市古先生发起了集体责问。我倒是站在了市古先生一方，主张可以使用美国的资金，购买资料，进行积累。

数年后，发起反对运动的人们最终也都使用了当时购买的那些资料。对此，我认为，由于资料本身是不带有倾向性的，我认为，对学者而言，以这样的方式收集资料非常重要。

然后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1967年，我前往中国逗留了1个月左右，由于耳闻目睹了当时的现状，所以，对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应该说是站在了比较客观的立场上。

JETRO（日本贸易振兴会）设立了中国市场调查团。调查团主要是以实业家为中心，有3位大学教授作为顾问参加了该组织。我的身份是副团长，专门负责安排访问哪里、看些什么等事情。准确的说，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非常感兴趣，觉得这一革命也是继承毛泽东革命思想的一种方式，自己对这一方面的印象尤为深刻。

同时也认为，这种做法无法维持生产，尤其同行者皆为企业人士，他们视察了各个工厂时，虽然听取了由造反派等出面进行的说明，但以这样的思想，这些工厂甚至在半年后就会停止生产，无法继续运营下去。

基于这一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认为应尽量大量阅读资料，站在客观审视的立场上观察。坦率的说，始终采取带有批判色彩的态度，将重点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不可能长久的方向上，撰写了成果报告。从这一意义上讲，我的态度让中国的造反派非常焦虑。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我们认为你是亲华派，对中国革命史非常理解，看来也有想不到的地方。然后警告我说，不要对年轻人讲这些，他们会愤怒的。

话虽如此，但我与中国朋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和造反派没打过交道，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接触很多。总而言之，我是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观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认为自己可以说并没有被卷入其中。

其后，在现今的学术界争论中，由于对内在因素发展论的误解，认为它是传统主义，认为内在因素发展论是一种倒退，争论非常激烈。不过，这种批判并不是有组织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若说是受到了鹤见和子老师等人的批判。她们对重视自然、关心环境、重视人类的人道主义性质的生存方式，即在生存过程中较为重视自然、重视人类、重视传统的人类互助持批判态度。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为鹤见和子老师等人之所以最终只属于少数派，其意见没有出现扩大化，是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是个人性质的批判。我自己的内在因素发展论，归根结底是认为理所当然应该重视积极吸收外来的东西，因此并没有怎么卷入争论之中。只是与鹤见和子老师进行过很多次争论。

在当时的争论过程中，我认为自己的立场较为公允。当进入学者圈子后，则需要应对许多外部因素以及不断深入的全球国际化的潮流，要重视科技的发展。由于自己没有去刻意强调这些方面，在一些场合被批评为“总之，宇野重昭的观点属于重视传统论”，在研究会做报告时也曾受到过批判。

但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人们尚未真正理解我的相互冲突论所具有的、非常重

视外部因素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内部因素这一独特的架构。因为我的观点归根结底属于内在因素发展论与反映外部关系的相互冲突论的结合体，从这一意义上讲，我的观点并不孤立。

迄今为止，相关争论仅限于“这一观点仅为宇野重昭的一家之言”的范围，并未发展为正面争论。我认为原因在于其与鹤见先生的纯粹的内在因素发展论不同。

※※ 十分感谢，您讲解得十分清楚。余下还有两个问题，我想请您将两个问题合并起来谈一谈。

首先是第 20 问，是关于您的研究工作中的“最大成果”问题。此外，追加一点您尚未谈到的问题，即“最遗憾的事情”。只是第一问。

最后是第 21 问的“如何看待今后的中国研究方向，对今后的中国研究有何希望”问题。如果概述有些困难，您可以谈谈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事情。再有，如果您认为自己还有尚未完成的研究，也请一并谈一谈。

宇野：好的。在我迄今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中，规模最大的便是资料的收集。包括前面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共 12 卷）以及《新中国资料集成》（共 5 卷）。策划这些项目并使之付梓。总之，我认为首先必须从研究生中找出有志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人，因为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整理这些基本资料集规模最为庞大。

但是，就自己所从事的实际工作而言，仅凭纯粹的资料收集是无法研究历史的。当然，在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加之资料齐全，中共党史也将以所谓的宇野重昭开创的方式进行编写。因此，与其被认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更希望被人们评价为对中共党史作出了独到的阐述。

接下来，希望能够对中共党史的时期与地区部分进行重新撰写，同时包括人们的实际生活、农村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内容。在思想结构的变化与所受到的全球影响之间的关系方面，则需要重新撰写中国杰出人物产生的过程以及由他们所创立的政党的存在必要性。最后则希望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从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这一角度对中共党史进行重新编写。我想，这些大概就是尚未完成的内容吧。

谈到遗憾的事情，应该是自己出生得有些过早了（笑）。这是因为，自己最初开始中国研究时，恰逢意识形态盛行期。从这一方面讲，在希望以资料为基础，进一步学习中国革命史，并决心更多地利用资料，学习太平洋战争史时，由于受到了当时拥有顽固意识形态者们的许多无益攻击，自己在“防守”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此外，在刚走出研究生院，尚不够成熟时期，被叫到聚集了几十人的“宇野重昭批判会”之类的会议上接受批斗，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重压，也给自己的研究进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换言之，战后出生的人，他们的青春时代是在追求何种方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过程中，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此外，对学者而言，在对华关系处于最重要的时期，由于日中关系发展并不顺利，没有踏入中国国土，到那里留学的机会。我认为，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前往中国留学，以相同的学生身份，同中国人一道学习 1、2 年经验的话，将无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最终我也没能有这样的机会。

日本人能够较为自由地前去中国开展研究，大概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其

中的象征性时期为 1982 年之后，因为其门户正式开放于 82 年至 84 年间。当时我已经年过 5 旬，自感已经过重新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年龄了。基于这种情况，身为中国学者，只能以欧美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开展中国研究。由于阅读的绝大多数中国研究成果为英文著述，这无疑会给自己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认为就中国学者这一层面而言，自己已经脱离了最重要的主流派群体。

另一点或许与上述问题有些脱离。我曾撰写过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的《岩波讲座：现代中国》系列之一。在编写日本的中国研究情况时，我发现日本人始终以极端的日本的观点与价值观研究中国。了解中国，需要适应中国，并以中国的观点为基础。其后，美国的 p.a.科恩曾提到过这一问题。总之，与其说是在研究中依据中国的观点，适应中国，莫若说是正在按照日本的观点及日本的价值观，并以日本的现状为背景的环境中开展中国研究。因此，日本人常常是带有偏见地观察中国。因此，人们常说的“摇摆的中国”，其实摇摆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是由于他们在分析中国时，与日本的情况结合得过于紧密，因而表现出了摇摆。从这一意义上讲，原本应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开展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在终于出现了这一氛围时，自己已届暮年。这一点令我感到遗憾。

※※ 最后是有关今后的中国研究方向及对今后的中国学者的期望的问题。请您就此简单地谈谈您的意见。

宇野：用一句话概括地讲，我希望日本和中国的年轻的骨干学者能够迈进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完全以中文或日文进行彻底讨论的时代。这样一来，将会出现与迄今为止的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及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所不同的成果。

例如，岛根大学在研究一名叫做西周的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中国也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因此，在对这一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研究方面，日本、中国及韩国的学者可以开展合作。这在几年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此外，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对严复、康有为等的各种研究项目。我相信，日本人在研究领域将迎来对中国人而言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时期。

从这一意义上讲，今后的中国研究将会在日中相互理解的逐步加深中得以开展。尤其是在日本国内，目前依然有许多人对中国抱有很大偏见，而且到处都有含有极大歪曲性因素的中国论书籍的情况下，我更加希望在以学者骨干及年轻人为核心的正式交流和研究中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如果再看得长远些，虽然目前韩国已经加入进来，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研究很是盛行，今后将会发展到一种新的形式——俄罗斯加入进来，其后也会有蒙古参与进来。从这一意义上讲，今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将表现为三个层次，即日中关系层次、整个东北亚的比较研究层次以及包括观察全球其他地区的欧美新型学问在内的积极意义上的全球化层次。虽然全球化负面影响非常之大，但从其正面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东北亚中的中国研究以及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三个层次今后将会取得发展。这是我的未来期望。

※※ 感谢您的说明。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些了。

宇野：对了，我想再说一句。

※※ 好的，您请讲。

宇野：前面，我以普通的抽象形式，重点强调了今后日本国内的中国研究问题，如今，听过我的讲义或参加过我的学习班的人已经先后成为了大学教师或学者，同时，中国留学生也开始在日本接受指导，撰写论文，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开始成长起来。这虽然是我个人的想法，但这的确令人欣慰，我希望这些人将来能够在良好的国际合作中开展研究。

※※ 多谢您接受采访。
(录音结束)